



中国智库：影响力构建与提升

时间：2017年7月20日 10:00-11:45

地点：宾大沃顿中国中心

主持人：

田薇，CGTN主持人

嘉宾：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研究员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及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

王莉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副教授

易鹏，盘古智库理事长

华桦：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宾大沃顿中国中心参加今天关于中国智库影响力构建与提升话题的研讨。我是宾大沃顿中心的负责人、董事总经理华桦。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和清华-布鲁金斯中心来合作举办这个研讨，宾大中国中心是两年前开始设立的，我们在这里大概两年多举办了200多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中心的宗旨就是促进中国和美国，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沃顿商学院中国的教育机构，中国的政府机构，包括学生建立一种文化教育和各个方方面面要求，同时也服务我们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沃顿商学院在中国的校友，那么今天我们能够举办这样的关于中国智库影响力构建与提升的研讨，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下面我就交给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齐晔教授来对这个活动的具体安排做一个介绍。

齐晔：谢谢华总。我们跟宾大沃顿中心是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当中举办了几次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也是缘分。在炎热的夏天，我们讨论这样一个话题，中国智库影响力的构建与提升，智库是思想库，我希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清爽的思想的盛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这

是一个非常豪华的阵容，待会儿我们会听到这些思想者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分享。智库又叫思想库，既然是思想库就离不开思想者、思想家，事实上这些思想者确实是我们智库的核心，也是我们智库的核心竞争力。2013年习主席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在去年推出了第一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当中，首当其冲的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天也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研究员房宁教授。另外一类智库的代表就是我们大学的智库，大学的智库的第一批当中有五个大学的智库，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是作为第一批国家高端智库的建设的试点单位，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副院长王莉丽教授，欢迎。最具特色的新型智库的建设其实是我们异军突起的民间智库的建设，民间智库的建设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智库是我们盘古智库，盘古智库今天有盘古智库的创始人理事长易鹏先生。今天我们的主题演讲是来自于我们，请允许我不谦虚的说一下，因为不是我说的，这是宾大说的，宾大搞一个全球智库的排名，根据每年宾大智库的排名，全球的第一智库就是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今天有来自于布鲁金斯学会我的同事李成教授。李成教授不管是在中国也好，还是在美国也好，他对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同时在布鲁金斯 101 年的历史上李成教授是第一位华裔主任，他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李成教授最近这本新书就叫做《理念的力量》，因为智库就是要提供思想，就是提供主意，这个思想一旦被广大群众掌握就变成无穷的力量，其实思想一旦被我们的决策者掌握，那就会变成就更加重大的力量。李成教授他是对于中国智库的分析和中国的智库和全球智库的对比，形成了最近发布的这本新书，目前只有英文版，但是今天我们是在中国首发，我们来倾听一下李成教授他对于智库的分析。在我们智库这个行当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就是当李成教授在发声，大家都在倾听，现在让我们欢迎李成教授。

李成：非常感谢大家到来，盛夏时节大家能够来我非常感动。刚才谈到了今天我们研讨会三位评论者代表的三种不同的智库，官方的、大学的、民间的。实际上还有第四个，就是齐晔教授所代表的海外和中国合作的智库。这在

20年前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在11年前我们布鲁金斯学会在中国清华大学建立了海外中心，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也只有两三所美国智库在中国建立了智库，还有一小部分大学、基金会在中国落地。我想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以后这种现象也会更多。

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田薇来主持第二轮的研讨，不仅是王毅外长喜欢看你的节目，在海外的很多学者几乎每天如果有播出都会收看你的节目，它是了解中国发生的、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了什么的非常好的平台。还要感谢房宁教授、王莉丽教授、易鹏理事长，他们都是我非常崇拜的中国智库学者，在中国智库第一线做着很大的贡献，所以非常感谢你们，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听到你们的发言和指正。

我新书的题目是《理念的力量：影响未来的中国思想家和智库》。这本书主要对象并不是中国的读者，而是美国及英语世界的读者，本书也是我过去八年当中对中国智库和中国思想家追踪分析的论文集。其中有些部分已经在之前发表过：或者中文发表后翻译成英文，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渠道发表，然后编在一起。这些都是2009年以后发表的文章。另外我也新写了几章，尤其是长篇的引言。

有趣的是，西方对中国的智库很不了解，这也是本书写作的背景。在这本书里面，我想阐述或者解答三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中国智库近期的发展是否意味着智库本身是海外观察研究当今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窗口？第二，中国的学界是否是充满生机和多元的？第三，当今的中国是否有思想家？我想这三个问题在中国和在海外都极富争议性，但我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非常明确——“是”。下面我会阐述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这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宏观的大背景。当今中国正处于智库快速发展的阶段，2013年习主席把智库放到国家战略层面去推动，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难免会有很多不同观点，有些说是“一窝蜂”，智库往往非常雷同，谁都在搞智库。我想这些批评尽管有些道理，但是从总体来讲它忘记了更主要的——智库发展背后社会对政府的推动作用。这本身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有些智库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复存在，就像其他国家一样，有些则会变

得更强大。我们今天请来了四位专家学者，他们代表了不同的智库，这本身也是中国智库多元化的一个验证。

而西方或者是外界、外国对中国智库的研究非常欠缺，我这本书是仅有的两三本英文专著中的一本。当然还有几篇文章，包括我的朋友著名学者沈大卫也写过智库的文章。大多数研究对中国的智库“不屑一顾”，认为中国智库都是政府的传声筒，或者是经常说的“库多智少”，我对这些观点持保留意见。同时，很多国内智库学者、大学学者或媒体总是认为中国的智库跟海外智库具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布鲁金斯已经创立 101 年，美国的很多老牌智库都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中国，虽然社科院也是老牌子，但是很多智库实际上都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建立起来的，实际上中国政府真正强调智库对国家战略的作用就是最近四年时间，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许多智库当然难免会显得不成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国内的有些同仁有时候好像过于高看西方的智库，而没有看到中国智库本身所取得的一些成绩。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想要通过我的书来解答的。这并不是说我没有看到中国智库的问题，也不是说我认为西方智库不好。西方智库有其成熟的一面，我所熟悉的美国智库中的从业者和研究者大都是非常敬业和严谨的。当然一些中国智库如果现在不那么严谨，以后也要有对质量有新的追求，因为它要在智库间的竞争中生存下去。

刚才讲到了海外智库大多数通过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进行评估。我们看到十大智库里面有六个是美国的智库，当然布鲁金斯始终排名第一位。一方面，可能是西方智库发展的时间比较长；另一方面，也许本身排名也有很多偏见。但是几乎在前 20 位当中，很难发现中国智库的身影。所以从总体来讲，西方的智库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占据主导地位。回过头来看看，为什么美国智库在上世纪应运而生的一些原因和背景，有些跟中国是相似的，有些是独特的，这也给中国智库的发展带来一些启迪。

首先是政治的多元化，这跟美国的两党或西方的多党执政有一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讲，它就决定了大多数智库需要有中立性。当然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民主党派还是比较弱的，所以这就决定了中国智库它本身发展的特点。而西方也有它的特点，多元化是智库

的不同观点能够幸存下来的主要原因。同时它意识到了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尤其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很多政策领域变得非常复杂，不管是金融、能源或战略领域，都需要很多专业的人才来研究国内外政策。

其次是两党轮换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知道每一届总统上任以后有四千个位置是需要总统任命的，这四千个位置当中至少有 50% 以上的人才来自于大学和智库；非常有意思的是，实际上中国现在中央组织部管的干部也是四千人。所以美国的智库和政府的人员是“旋转”的，王莉丽教授写的一本书《旋转门》，就解释了美国政府-智库之间“旋转门”的机制作用。

同时，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对政府、政客或总统的不认可，另一方面是政府、政客和总统对智库的不信任。尼克松曾开玩笑地说，“我要把布鲁金斯的大楼炸掉”。这就从侧面反映，智库对政府对政客有一定的监督作用。当然，知识分子参政意识增强也起了一部分的作用。

再次，美国税法改革，尤其上个世纪的两三次税法改革，对智库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美国家庭的平均捐款数额高达 4000 美元，这 4000 美元当中有一部分是宗教捐款，另一部分用于资助包括智库在内的非政府组织，这一笔款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与之相关的是社会和企业，尤其是美国的私有企业，它认识到智库的作用，即政策探讨的重要性，所以在推动智库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是媒体日渐强大的需求。因为媒体需要采访专家，而这也使智库的学者们有了市场。这些就是我们在比较美国和中国智库之后所得出的美国智库发展的背景。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学者和中国民间对西方智库的一些理解的误区，好像认为独立性是西方智库最明显的特征，实际上我不同意这一点。在美国，很多智库具有明显的党派色彩，有很多智库代表利益集团或代表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并且智库并不羞于公开谈论其倾向。所以所谓的独立性，主要是由于两党政治保持了它的中立性，也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当然，独立性是我们布鲁金斯学会所要追求的，但追求是一回事，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全做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而很多智库，如兰德公司，是商务性非常强的智库。它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而是给它的客户做研究；而另外一些智库，像美国

传统基金会很明显是支持共和党的；还有一些智库包括美国也有一些政府的、半政府的智库，根本没有什么独立性。所以独立性是相对的概念。

影响力是另外一回事，并不是所有的智库都有影响力，美国约有 1600 个智库，大概只有二三十个智库是有较大影响力的。所以它有很多的局限性和非一致性。好像美国的智库研究的质量都非常高，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么高的话，我们不会在很多问题上判断错误，也不会这么多智库 2016 年大选时不看好特朗普。而且我经常说我们从事美中关系研究的智库工作没有做好，如果做好的话，美中关系不会有这么多误解和误判。当然可以说由于布鲁金斯、卡内基、宾大等智库的存在，让现状有些改观，否则的话情况会更糟糕。但是我们无法推测确认，只是知道美中关系里有太多的问题，而我们智库和智库的学者是有责任的。

财力资源的短缺是美国政府和民间智库普遍面临的问题。也许除了兰德——因为兰德赚钱，我们布鲁金斯从来不赚钱，我们是不能做承包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聘请人才，尤其是聘请经济学家非常昂贵，所以大多数存在经济非常短缺的状况；政府智库就更明显了，政府不会花很多支出在智库研究上，这和中国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回望过去十年，我们为很多访问学者项目提供资助，中国现在有很多一流的学者，尤其在国际关系上，像王缉思、袁鹏、贾庆国、吴心伯这些大师，都是我们布鲁金斯的访问学者。但是现在我们更需要人家来赞助我们，所以财力上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很坦率地说财力的变化也会影响智库的竞争力。

而最主要的挑战是，智库需要在政府、利益集团、学术界、商界、媒体、公众等其他社会组成中定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智库跟媒体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因为媒体会发现智库有时候跟它在做同样的事情。智库也可以即时的发表文章，因为智库学者就是库内的专家。所以这些定位都是非常复杂的，对于研究美国的学者来讲要紧密切关注这一点。有一些信息判断也许两三年前是准确的，但两三年以后就不准确了。

现在让我回答刚才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显的，智库确实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国家治理理念和智库学者的咨询建议的相关性中有所体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跟王沪宁以及上海的国际研究

所、华东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学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胡锦涛提出的“和平崛起”是离不开郑必坚先生的贡献和中央党校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同时胡锦涛的很多国内政策又离不开房宁的很多观点，所以“和谐社会”成了胡锦涛国内治理的主要的观念。而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离不开曾培炎先生及国经中心的研究的。这也就告诉美国的同仁和美国政府的智库，如果要研究中国却没有看清中国智库的作用，就是在犯很大的错误，因为智库是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再有“旋转门”，我们知道很多人从政府退下来到智库，他们其中的很多人其实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像郑必坚先生，还有以前在上海、后来到中央的赵启正先生，当然还有戴秉国、曾培炎等等，他们现在都还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外交政策、外交策略、经济政策和民间交往；同时“旋转门”也是在转出去，当然你可以说它的比例不够，跟西方四千个人来说远远不够，但是别忘了这里边很多是关键人物，已经或将要担任政治局委员，个别的还有可能进常委，这已经是很重量级的学者了。隆国强以前也在布鲁金斯做过一年访问学者， he 现在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我只举了几个例子，但这就是榜样的力量，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都在办智库，而且这些企业智库里的学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他们到四、五十岁的时候会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起很大的作用。

在金融界，如果要看中国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的大腕，就去看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大多数都在那里边。而比较年轻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这些人可能现在都是四十多岁，真的可以讲这就是中国经济金融的黄埔军校。

又如前不久中国决定建立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但是在 2015 年财新网的报道中已有所体现。两年半前，北大经济学家黄益平就已经在呼唤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智库在国家政策制定推广是有前瞻性的，是给我们很多的信息，西方老是讲中国那么神秘，实际上并不那么神秘，如果仔细观察，有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二个问题，中国学界是否充满生机和多元，这也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我的答案也是明确的，首先我们看中国学界各学科著名学者的不同观点，

我上星期在上海参加了社科院中国社会学年会，所以今天想用其中一些资料和数据和大家讲一下。

国际关系学科中，王缉思、阎学通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对中美关系的评估上的看法截然不同；俞可平和房宁先生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在政治学上关于中国政治的前景，关于中国应该走哪条路，哪条最适合中国的道路的观点截然不同；在经济学中，余永定、胡鞍钢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测截然不同；在法学，贺卫方和徐显明对宪政的观点也有所不同。他们这八个人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中国一流的学者，但是一流学者的观点在很多问题上——如对外关系、对世界的看法、中国政治走向、中国政治经济的前景、中国司法改革上观点是不同的。观念不同是好事情，这说明中国是有很多争论的、是多元的，而多元实际上也是习主席在强调智库发展当中所提出的一点。

另外，我想用中产阶级作为例子来讲中国的学术研究的领先地位。首先是1980年到2007年中国国内关于中产阶级和中产阶层的论文的数量和变化。同时中国出了很多研究中国中产阶级的著名学者。已故的陆学艺先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是里程碑式的巨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的蓝皮书都是帮助研究中国、了解中国的非常好的一个权威性的丛书，包括中国社科院李春玲教授的关于中产阶级的专著，这几本书我觉得都应该会留下来成为经典。但在西方，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英语学术书籍在2010年前就只有三四本。而我的那本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说是第一本英文学术专著，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叫《中国中产》。而中国关于中产阶级研究书籍，在我2010年的研究当中就已经超过了150本，这就是区别。这就说明我们对西方研究不能有过高的评价，中国学者有其得天独厚、近水楼台的优势，西方有学术严谨的优势。而中国正在赶超，有些领域当中已经超出了，尤其是社会学领域。

最后讲中国是不是有思想家，答案当然是有。目前中国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不多，并不是因为没有世界级水平的思想家，而是因为中国学界在世界范围内话语权的不足而产生的制约。在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提出后的几年里，中国就有两位土生土长的学者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和生物医学奖，这也就表明我们不应该低看中国学者。俞可平教授说过，“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

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布鲁金斯学会编辑中国思想家丛书是出于这样的理念：没有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像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当中，经历了这么翻天覆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在这些变化是不可能思想的真空中发生的，它会有思想碰撞的火花。俞可平先生就提到了思想家的重要特征，即影响力、预见性、批评性和多样性，也基于这样理念，丛书一共会有12位中国的学者，每个社会科学学科都有一位。我们的目的是提升中国学者的影响力，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这套书里每本还包括我写的很长的引言，介绍作者所代表的思想，以及他们和其他不同的学者之间的争论。

最后，是对未来的建议。西方对中国智库过低的估计，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可以停下前进的脚步。对于中国智库而言，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包括国际学术公认和同行的评议，尤其是铸造世界级的中国思想家。通过良好的研究环境，有能力出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政策分析的智库期刊的专家，目前还不是很多。还有就是翻译并推广中国有独特见解的学者学术专著，我们布鲁金斯学会能做就这么多十二本，这需要很多人努力，需要中国学者努力，需要西方学者努力，需要加强海内外智库的全面合作，目前来讲，情况并不是很乐观。

另外，中国的海归学者，太多是在欧美、日本受教育，很少有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或就读于并研究非洲和拉美的，这是很不平衡的，这跟中国拓展全球视野，成为世界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大国是有距离的。同时我们要理解什么叫软实力，它的“软”的真正含义，不是通过宣传机器，不是通过强势的、只讲自己的不听别人的方式。这不是对话，最终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最后也希望能够大量地吸收外籍研究人员和海外客座研究员。不管怎么讲，西方是非常注重这方面，我们布鲁金斯的第二个百年重点就是走向世界，为此我们在十年前开始在海外建立中心，在北京清华大学、在印度新德里、在多哈，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海外中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有竞争力，才会维持下去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有全球视野的和关注人类重大议题的智库。

齐晔：您时间把握的是完美的，精准的，您请坐。不仅仅是时间把握的精准，而且内容非常的好，刚才跟大家说了，当李成教授开口所有人都是侧耳倾

听。因为他的研究和他的讲授，不仅仅是有广度，而且是有深度，而且是有力度，而且是有温度。我们听了李成教授的报告之后，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更增加了自信，思想的自信，理论的自信。刚才跟大家承诺了，今天是一个思想的盛宴，每一个盛宴都必须要有有一个豪华的主持，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今天我们的豪华的主持，我们的主持其实根本不需要介绍，但是我还要罗嗦一句，因为她获得了许许多多的大奖，她有许许多多的经历，她曾经是我们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个驻美国华盛顿的女记者，而且她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青年的领袖。给大家再一次热烈掌声请出今天的主持田薇女士。

田薇：谢谢齐教授，谢谢您这么由衷的表扬和介绍，让我也感觉到自己就是布鲁金斯的一位好朋友，我向布鲁金斯各位老师和专家学者学习到了太多，感谢宾大这次有机会和我们一起感受今天的这个讨论。特别感谢李成教授，我简单说两句，我知道李成教授不喜欢客套，作为观众刚才听到李成老师演讲我有两个小的看法，我觉得是看到了一位对中国专家学者和中国的思想如数家珍的知识分子，他能够讲出所有人的名字，讲出所有人的观点和理论，让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发展的这样一些思想和声音，或者说是百家争鸣这样一种状况的尊敬和喜爱，我非常感激您这一点，这不是一年两年的积累，这是多年的积累。第二个我看到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论他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都在号召我们的社会体系要给到思想更多的这样一个光彩和支持，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李成老师。谢谢。

说到这儿，李成老师非常谦虚，他说今天一定要让很多好朋友多多讲，因为他的很多好朋友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非常丰富的思想和非常令人惊艳的讨论。接下来有请几位老师，我向大家来介绍房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有请房教授。有请王莉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副院长。最后有请易鹏先生，是我们盘古智库共同发起人，同时也是盘古智库理事长，盘古智库委员会的委员，谢谢各位。

刚才齐老师表扬我，主要他是让我好好工作，所以现在我就好好工作，作为一个主持人最好的工作就是少说话，第一点，多提一点稍微有智慧的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非常简单。智库怎么影响政策制定者？智库影响政策制定者，这是智库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如此，在美国更是如

此，那李成老师现在在洗耳恭听，我想请教一下房老师，咱们（今天）是政府背景的智库、学界的智库、民间的智库、中外合作的智库都在一起了，想必大家能够得出很有意思的观点。

房宁： 我用脚底板做学问：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靠对国家、对世界、对你所研究问题的了解，如果有了真知灼见，那最终会影响政府，也会影响社会。

王莉丽： 早在 2006 年我就作为智库的研究者在关注中国智库和全球智库的发展。07-08 年的时候我曾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过一年的访问学者，从那时我便高度关心全球智库发展，后来我回到国内参与中国智库的建设，一直到现在作为一个智库的管理者、从业者和研究者三重角色。智库的目的就是影响舆论，影响政策制定。那么如何影响舆论，如何影响决策者呢？它需要通过媒介，不仅仅是大众传播媒介，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三种传播媒介共同来影响决策者和舆论。要影响决策者，比如说我们目前做的大学智库，许多研究工作并不公开，而是通过内部渠道，通过一些国家级或部委级的“内参”直接影响中南海的政策制定。这是对决策者的一种直接影响。还有一种直接影响方式是应邀到各大部委去，就具体的问题直接与决策者进行对话。再有另一种就是通过一些内部的研讨会、报告、讲座等方式，做一些直接的对话。

这三种都是我们目前影响决策的方法。还有一种我觉得是“曲线救国”，欧美智库也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在美国像布鲁金斯学会、兰德、传统基金会这些智库，他们很多时候要影响决策还没有中国的体系内智库这么方便，他们更多的时候需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这种舆论的放大器影响整个国家的舆论，进而影响他们的决策者，这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在国内目前这种方式我们也运用得非常好，现在的国内智库，比如说人大国发院自己设立传播部门，也有专门人员来做我们自己的影响力传播，来大规模地影响社会的舆论思潮，进而影响我们的媒体，影响国家的决策。

易鹏： 相对于人大和社科院等智库而言，盘古智库成立到现在才四年多时间，应该说这几年比较活跃。我有一个体会，好的智库不一定是主动影响决策。现在决策层真的需要大量的建议，坦率说我们很多重大决策做的不是那么完美，而且严格讲现在领导人太忙，6 月份习主席在国内很忙，每天都有大量

的会见。很多部委的同志现在会议也很多。事实上领导人存在这样的需求，现在信息量爆长，变化极为快速，没有智库，领导人很难作出他自认为自信的决策。去年一年，有几十位部长级别官员到我们盘古智库内部来聊天，在内部聊天中他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关键在于你是否具备把智库打造好的能力和影响力。事实上现在很多时候要去了解一个观点，很少会单独去了解某一个智库，而是采取邀请不同智库的人来共同商议这种模式或者发挥智库动员思想者的能力。目前应该说对智库的需求越来越多，我相信未来十年、二十年，一定会有一拨在中国决策层发挥越来越重要影响力的智库涌现出来。

田薇：刚刚房教授讲得非常简短，您讲到只要努力做好自己的研究，就总是会发光的，真知灼见。我是在想，实际上您是在说一个道理，就是知识分子要坚持。您是在讲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和思想，继而用这样一种坚持去影响别人。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是不是符合您刚才的想法？其他两位老师更多从各自智库运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来阐述智库和执政者之间的关系，我想请您从思想的角度来阐述一下。

房宁：首先刚才他们两位讲得非常到位。李成教授讲到美国智库和中国智库产生背景不同。其实中国现在也在多元化，其中也包含了自身的利益和诉求，进而也会转化为一些舆论，或者说政策方案和咨询意见。王教授提出了市场的问题，客观上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说别的智库，我只是说我们单位，或者我作为一个学者，个人的一个理想。现在中国也有代表房地产商的，也有代表新兴产业的，也有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也有代表所谓部门利益的，但是我想谁能够代表国家或者代表人民的整体的利益，或者是长远的利益，或者叫根本的利益，我们希望努力地去探索。我觉得像中国社科院，像我们政治学所，像我本人，我们特别希望在各种利益、各种舆论、各种思想多元化的这种博弈——当然这种博弈的存在是合理而必然的——之下能够稍微超越一点，稍微地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之上，能够综合考虑，转化成国家的根本的、或者更加长远的一些考量，这是一些哲学的、价值观层面的想法。

具体来说我们现在的体会，第一就是要科学化，因为中国的智库或者中国现在的问题，刚才李成教授讲得非常好，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现在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都太哲学化了。在美国历史上曾有行为主义革命，政治学从政治哲

学更多地向政治科学转化，我觉得中国现在也到了这个时代了。简单地说，政治哲学是在谈理论对不对，那政治科学就是要研究成不成。现在作为智库更多的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是在讲一个理想的最优方案，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做好的方面之一。

第二，恐怕就是国际化。世界正在走向一体，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很难区分国内外。也就是说，要真正地去影响政府也好，影响社会也好，或者说给人民带来福祉的话，肯定要有有一个世界的眼光，一定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以世界为方法，或者以中国为目的等等。所以应该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才能够做好自己智库的工作。

田薇：我想就房老师刚才提到的世界变化快，再接着聊一聊。今天活动之前，我非常荣幸跟李成老师有一个小小的采访，李成老师主要谈的当然是中美关系问题，但是您也提到了大家固步自封的一种思想体系，对我们现在作为思想和智库未来发展的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谓的舒适区，舒适区无非是我们都知道多少年的事情，我们都习惯的思维方式，我们都想明白的道理，我们甚至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它每一次都套在我们研究的任何问题之上，把它每一次都放在我们任何一个阐述的过程中，我想就是所谓的舒适区吧。但房老师刚才特别提出来，我们实际变化太快，这个舒适区如果不打破的话，怎么能有新的思想，或者有意义的思想产生？怎么打破固步自封的舒适区，我想这可能是束缚我们大家的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各位在打破舒适区方面，有何建议？

房宁：作为学者，一定要不断地去探索。其实我们老说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研究实际问题，理论是从实际问题里来的，所以现在中国的智库最重要的是俯下身子给中央服务，中央说叫痛点、独点、难点，你还得挠到痒处。舒适区现在确实是中国的问题，固步自封、自以为是，这是很耽误事的，所以要冲破舒适区。

王莉丽：我有两个观点想补充，刚才易鹏老师谈到他们不愁怎么去影响决策，因为现在特朗普执政之后，全球未来趋势很不确定。比如说去年年底人大开了一次内部会议，公开发布了一系列我们对特朗普执政以及全球变化的一些判断。半年前我们学者的预测是特朗普要实行全球紧缩战略，目前看来很显然与特朗普真正的全球政策有很大出入。中美之间的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必然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未来很不确定。这个时候，中国面临的内政外交困境及其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都非常大。中国这些年为什么智库发展得这么快，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应该说是给予了很好的顶层设计，有相对很完善的政策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高层的确非常急需高质量的思想，可以说现在政策制定者可谓是求思想若渴，只是现在缺乏高质量的思想。中国智库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传播，而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质量的成果。很多年前我在美国时，我个人认为美国智库存在一个“过度传播”的问题，这种过度传播一方面影响智库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使得智库学者与媒体评论人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一定的模糊性，削弱了智库研究的深度。

回到刚才田薇和房教授说的舒适区的问题，我的理解就是“改革乏力”。这些年中国智库的发展欣欣向荣，国家制度层面建设、政策层面顶层设计应该说做得非常好，可以说目前在全球范围之内，没有哪个国家对智库发展如此重视，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像习近平主席这样对智库投入了如此高的关注度。目前我觉得从宏观层面，我们的政策和制度保障相对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是在微观层面，官方智库、大学智库、民间智库很多时候是在舒适区里，我们的改革缺乏活力，缺乏动力。四年前我写过一篇内参，这篇内参直接影响了中国大学智库的发展。我当时做了一个判断，认为中国如果想产生中国的布鲁金斯、中国的兰德，最早应该会出现在大学，因为大学最具备创新的、改革的土壤。随后教育部出台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但是四年过去了，中国大学智库虽说也是欣欣向荣，但是大学过于集中地投入智库建设，一窝蜂地在搞智库，我们的改革缺乏核心的推动力，存在很多机制的问题，下一步要走出舒适区。

易鹏：其实坦率说，盘古智库最没资格谈舒适区，因为我们真的属于“屌丝逆袭”。我做盘古智库近四年时间，白了头发，因为我们是民间智库，我现在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募集资金，现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压力也比较大。

盘古智库是个民间智库，这里有个鲶鱼效应。我一直讲民间智库在中国当前的智库建设中是一条鲶鱼。当前我们的体制、各种智库面临改革的问题，我认为难度确实比较大。思想和管理中间有天然的对抗性，智库思想是分散式

的，难以用严格的组织管理思想。实际上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心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影响力很大。而我们现在可能有些智库人很多，但是它的影响不是那么大。影响力，有学术的影响力，也有政策的影响力、媒体的影响力等各个方面。我们去年做了 203 个活动，几乎天天有活动而且层次还比较高，从开始做活动到最终做成需要七天时间，这个是没有舒适区的。但是反过来讲，就是因为没有舒适区，我们也被迫地拓展了人才、资金、渠道、品牌，这也是一个快速拉升的过程。现在盘古智库拉升了有四年，目前也到了临界点，团队中间开始有放松的情绪，所以我们不断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打鸡血，聊聊人生的价值观。各种挑战意味着中国民间智库有很大的潜力，跨越舒适区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影响力有质量的智库。

田薇：大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舒适区进行了解释，房教授更多地是从思想的力量去解释，王莉丽教授更多地是从智库本身、内部管理和对未来评估的角度来说，易鹏先生更多地是从民间智库的角度来谈。我想延伸一个话题，说到底智库能给社会、给我们未来国家乃至世界带来什么？我们怎么能够真正做到坚持和发现一些新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能给未来提供一些新的道路？我发现有些智库更多的是在中央政府已有想法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研究。有多少能在原发的思想之上形成一种很好的思想体系和讨论，进而再进一步影响到我们的执政者，我们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相关政策制定人？我想各位老师 在运作智库的过程当中，对这方面有很多思考，这想必也是中国智库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请教各位，在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已经起步？现在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有利的因素，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动力？

易鹏：我认为原创思想也是智库的一方面。智库间有很多共通性，像盘古智库现在投入很大精力在做国际关系，其沟通交流的平台也是智库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举个例子说，去年我们去了韩国无数次，上上下下我们接触的非常多，我对李成主任的观点非常认可，中美之间都会产生误解，那中日韩、中印方面，也会产生误解，而在化解误解方面，智库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盘古智库过去几年中集中三个国家的研究：土耳其、印度和韩国，最近几个关键结点都

用到了。例如最近印度的情况，我们出了很多策略，交流了很多次，我认为这是一个智库对国家的影响。

王莉丽： 这个问题坦白说我也是非常有感触，因为最开始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叫传播能力，我觉得中国智库传播力不成问题，尤其是在国内的传播力。中国智库现在在国际上的传播力还是比较弱的，尤其是社交媒体传播意识和能力，中国智库有待整体提升。

另外一个层面，还是回到思想创新能力。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思想创新力是怎么产生的？我觉得中国不缺人才，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士大夫的传统，千古以来都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效力于国家。中国古代有科举制，构建了知识与政治的桥梁，但当代，我觉得我们中国现代智库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又重新构建了道统和正统之间的桥梁。中国不缺乏人才，在机制上，顶层设计也在推动“旋转门”，但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中国智库整体创新能力仍然很薄弱呢，我觉得一个是智库运行机制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人才选拔以及激励机制的问题。因为人才需要有一定的环境和土壤才能够发挥出整体的创新能力。

智库的人才最核心的是两种，一是智库的领导人才，二是智库的研究人才。目前我们不缺研究人才，我们缺的是机制和各方面的保障。我觉得智库的学者、政策专家、核心人员首先要是在某个领域的专家，在某个领域有很深的耕耘和研究，然后才能就这些政策问题发表他的建议和观点，而不能过于广博。你要影响的是国家决策，影响舆论的思潮，如果你就某一方面的问题缺乏深度的研究，就对政策问题和战略的前瞻性问题发表观点的话，那么很可能会误国误民，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房宁： 有一个话叫做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问，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做学问的方法。说远一点，现在有一个说法——“民国粉”，有人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学术的高峰，的确是。但那个时候我们把它叫做范式的转换，因为那个时候世界走在前头了，中国落在后头，那人家是过来人，人家是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中国虽然是所谓的积贫积弱，但是也要走那个道路的时候，你看看人家的，把它拿过来一转换，当然得结合一点中国的实际、接点地气，就产生一大批的思想家。

意思是说，那个时候这是可以的。现在世界又来到了一个未知的领域，这个时代做学问，我们认为应该是观察法，是归纳法，而不是过去的演绎法了。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提倡所谓的脚底板做学问，说的就是要直接面对中国的社会实践，要真正的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归纳去发现这种因果联系，当然也要有世界的眼光、历史的经验、理论的启发。但是核心问题还是要回答：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你先回答了，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去产生你的思想，进而去影响社会，影响政府，影响政策。

田薇：非常有意思，房教授提到了几个 W 这样的问题。作为记者，我们是天天要读的这件事情，但是看来由于世界变化快，所以我们的学者们和我们一起要同时思考，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观察。李成教授每一次来交流都特别希望和更多的朋友们进行交流，也希望大家就我们今天台上的各位嘉宾和学者提出的真知灼见提出您的看法或您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我们接下来在有十到十五分钟时间，跟大家互动。

提问 1：我们在考虑人类这种冲突和谐的时候，是考虑冲突重要，还是考虑和谐重要？

李成：当然有它历史的传承，房宁教授他的整个最终的历史最终的哲学，他的功底非常深，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展示了一连串的文章，在 20 多年前，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她的论文。同时房宁也是中美关系研究的专家，他也在这方面写过很多书。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有一定的道理，也反映出了中国年轻人在当时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思路当中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些都是背景，所以我特别庆幸。刚才各位讲到的，如果有机会，我会讲两三分钟，你们刚才讲的非常对我有启示，尤其是讲到了智库的影响力，智库这方面，包括独立性，包括智库的创新，包括智库怎么摆脱自己的舒适区。20 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艺术，实际上我最近在写关于中国艺术。20 多年前我写的文章，我的标题是 21 世纪的毕加索为什么不是中国人，但是几年以后，这个题目论证了，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有几个报告都告诉整个世界上排名一百位的先锋派艺术家，也是通过他的（英文）有 70%、80% 用中国文字，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意思，实际上他是艺术，他不要用语言，这方面中国的学者摆脱了语言西方在英语世界统治这个格局，出现了世界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哲学

家。我们布鲁金斯去年还请徐冰和范迪安到我们这里做演讲，也是爆满的，它是在真正意义上来讲是世界上非常有创意创新的艺术家。未来咱们中国能够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这里面有很多年轻的学者，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觉得中国的智库和中国的学界现在有个急躁情绪，也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也有一种市场化以后的冲击，也有在政治氛围的一个态度，人一定有很多状况，这些都是事实。但最终是取决于刚才房教授讲的你自已真知灼见，脚踏实地，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理想要高，但是做的事情要细，要具体，而且最好是能够有语言上的补充。

而且我个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可能是大多数在中国，因为中国的变化太大，而中国中西方的很多东西你能够包容，能够融会贯通的话，一定会成为大学者，这我是完全有信心的。所以你们的命题一定要非常高，同时又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结合，这在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研究当中讲到，中国现在非常庆幸的大学并不完全是海归，还有很多土生土长的学者也在成长，这是健康的，这也是中国本身的，齐晔老师讲到了自信，当然要有自信，有很多中国自己培养的学者也是一流的，但是它是要有交融，而不是固步自封，而不是对西方不了解的，它是基于了解，更关键你是不是有一种很好的心态，有一种正确的观点去对待，我觉得要不要太烦躁，不要太急功近利，要做大学问，同时要有对很多具体的时政跟命题的结合，中国跟世界的结合。

房宁：因为在座很多年轻朋友、以及李成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个看法；刚才讲到“钱学森之问”，我参加了香山会议，就是他的那些弟子们在讨论钱学森的思想。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咱们就说所谓大师的问题、大师在我们看来有两种，一种是像易鹏讲到的开拓性的，咱们中国的传统叫“亦军亦师”，在中国能够讲思想，过去都是天地军亲师，实际上是统一的；大臣不能够讲思想的，那就僭越了，那不是你说的，说我们叫经典作家，我们都不是经典作家，你怎么努力，怎么脚底板做学问你也当不了经典作家。

说大师，这是一种开拓性的大师，轴心时代，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是诸子百家，这个时代下如果说钱学森他指的是这个，那是可遇不可求，那要看时代或者看机会。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肯定是有大师，为什么呢？我说的这就叫里程碑式的、每一个时代都一定会产生这个时代的大师，你像莫言他的小说，像现在很多歌曲那些作家，包括可能不是大师，也是“中师”、“要师”，像李宗盛等等。实际上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一个历史和价值，但是后人要想了解这个时代，你说他怎么了解，他没法了解，他太细了，我们今天这个会也很有价值，他不可能知道，五百年以后不可能知道，所以后人要了解那个时代，他一定是通过那个时代的一些有话语权，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就像那些经典。所谓经典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呢、能够流传下来的、就是你对这个时代最本质，最重要的那些东西的反应和记录，它一定会在一些思想家或者一些作者的文字里头，或者他们的什么作品里头；所以以后的人是通过这些人来了解这个时代，所以这些人其实就是大师，中国现在这个时代无论怎么样他也确实是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重要的时代，我希望你过五百年也会是这样看的。所以，你要是想当大师，在做大师，可能你们都有，这当中都有，他们也许还有希望。那么你就好好的去记录这个时代，进而认识这个时代，你成为这个时代最好的记录者和表现者，你就很有可能成为大师。

田薇：费正清先生说的所谓记者的美梦，李成先生特别提出这个说法，实际上并不是记者，我想这是所有人的美梦，所有研究者的美梦就发生在当代中国。我们再让大家提一点问题，因为大家有很多问题，我们简单一点。

王莉丽：我补充一句，因为刚才这个问题，如果待会儿再说就有点迟了。李老师说到，因为在座有很多年轻学者，房老师也在，我特别有感触一定要说一下。我去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在李成老师家作客，他在书房，两个书房，分别在写两本书，坦白说、跟李老师相比，李老师是我的老师，我是晚辈。在座各位又有比我年轻太多的。我面对李老师经常觉得自己很不够努力，所以我觉得诸位，李老师这本书我很有幸是在一两个月前就拿到了，就已经先读为快了。这本书应该说是李老师对中国的智库的发展，这么多年的观察，可以说集精华于一身的，思想深度非常之高，我真的强烈推荐，我也觉得我们在座诸位年轻诸位都应该继续努力，向我们的前辈学习，向李老师学习。

提问 2: 谢谢老师的分享。我的问题是今天我们谈了舒适区跟创新思维，就是说学者在树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情况下，怎么结合自己固有的知识体系来平衡创新思维。

提问 3: 各位老师好，前面李成老师提到对未来的展望和建议那一部分提到了软实力这个概念，这个话题在中国特别重要。所以就是希望各位老师能不能简单分享一下对于中国软实力战略的一个建议和思考。

提问 4: 我的问题是怎么样处理好论证领导的观点对和坚持论证自己的观点对，这个之间的关系，作为智库。

提问 5: 我是研究媒介公信力的，我就是一个问题，请问各位教授对咱们国家的社会公信力，社会信任和政治公信力怎么看？

提问 6: 请各位老师，谈一下对于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建议？

提问 7: 关于智库的发展，刚才房老师也讲了，现在有哲学化和科学化的这么一个方向，我想问的是怎么看待中国智库在发展过程当中究竟是我们在由理论学术化向实践化发展，或者是实践化向学术化发展，还是说我们现在需要怎么考虑这样、去对待，当我们的智库的学术化它要如何去影响世界，如何采用一种全面中性的方法论去影响到具体的决策或者实践，反过来讲，就是说同时我们又怎么去对待在更有时效性的决策研究它的时效对我们原先的这些方法论的一种瓦解，或者是一种冲击。

提问 8: 非常感动，各位老师有很深的情怀和使命感，但是光有情怀还不够，还是会面临很多现实问题，比方像李老师和易老师都会面临筹集资金的问题，怎么去处理，解决现实的问题和智库保持自己独特研究的。

提问 9: 请教各位老师对企业智库建设的一些经验和建议。

提问 10: 我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国的智库会发生一个明显的研究内容的转向，就是以老百姓的利益，就是民生问题为主。

田薇: 咱们简单归纳一下，问题非常多，实际上有几个，和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软实力，比如说社会性这些问题，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怎么活下来，企业智库怎么来进行进一步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大家实际上已经在讨论了，可能还是希望各位能够用一两句话里总结一下就是

智库到底应该是干嘛的，我们怎么把应该干嘛的这件事干好，实际上就这么简单。请几位老师大家各自自告奋勇，来回答其中一些问题。李成老师先来吧。

李成：几个问题，第一个软实力。我觉得中国的智库而且不久会有、甚至现在已经有智库走出去了，他们很多在西方被认为一个中国宣传的工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定位，作为我们布鲁金斯学会到中国来，我们不是要来宣讲美国价值观念的，我们到中国来是更多了解，第一线了解中国的变化，要更多的倾听，要了解中国社会的很多变化，同时来解释可能的一些误解，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应该说还是有的，但是同时我们更强烈的是觉得要对我们所在国要有很多的尊重，同时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发生的一些变化，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定位的问题，所以这个软实力就是要软，这是我讲的意义，它不能够被歪曲了。

刚才讲到了有几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包括公信力，包括捐款，包括民生问题，我这次来中国有很多事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见我们布鲁金斯在中国的恩主，因为布鲁金斯是接受中国私有企业的捐助，但是我们不接受央企，不接受政府的捐助，非常忌讳这些事情；这里边你就存在着公信度问题，为什么要捐你的款？首先捐款它并不是要影响你，我们的独立性非常清楚。中国也许私人银行要研究中国的金融，我们是不能够研究这个事情，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研究什么，我们的报告是不同你干涉的，这方面我们是把握的非常清楚，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有时候我们会退掉很多钱，布鲁金斯有一百年的历史，我们不会为短时间的困难而把我们公信度把我们的声誉搞坏，我们所有的研究员他对智库的敬畏，由美国公众他对智库的重要性的认识。但同时智库要反过来为社会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中国智库是有研究民生问题的，有很多在研究民生问题。而且由于中国智库现在大规模智库热，它会有很多会有淘汰，而不淘汰的就是因为它特殊性，而不淘汰的也正表明了中国智库在走向多元化，它如果都是相同的，你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所以，这方面是给我们带来信心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问题，我想中国智库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尤其是未来的，智库会更加重要，但是智库跟捐款人之间的作用他们是干涉你，或者影响你，是不是利益的冲突，这也是中国以后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

公信度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失去了这一点，当然你的智库就能变成了像利益集团或政府的传声筒。

田薇：李成老师说这个非常重要，公信度尤其从长期来看这是真正的立足之本。

易鹏：第一个观点，我认为智库还是要有全人类的思维，人类共同的挑战，还是要思考这个问题。刚才社会的问题中间要解决，当面临全人类问题的时候，你可能面临的服务者，不但是国家决策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比如艾滋病、气候变化，避暑说贫富差距，这一系列问题中间，一定会有，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观点，我认为智库中间发展，在中国目前面临募资的问题中间，我一直反复讲一个观点，智库要被供养，学者要被包养，我讲的逻辑是什么呢，智库供养是要多元的。比如今年找了一个老板，他一个老板给你捐了钱，突然这个老板去世了呢，怎么筹呢，所以我认为智库要有众筹多种力量来，所以我觉得得供养，累一点，但是操盘人要有足够的能力和魅力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学者要被包养，说实话，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北京房价太贵，生存成本太高，如果说每个学者能够让你衣食无忧，不见得大富大贵，他是能沉下去做一些研究的，也就是包养他的时间，不是包养他的思想，也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说我曾经跟一个富豪聊天的时候，我说你不是喜欢艺术吗，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拿十个亿出来，包养一百个艺术家，让他们自己没有任何生计忧愁，让他们自己去搞艺术就是了，或者包养一百个，十个也可以，你支持他，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无怨无悔，不要有利益诉求。但我认为中国这个时间快到了，因为确实一拨人，他发现钱花不完了，他感觉有必要，讲好听的话、就是价值观，讲不好听的话、他都愿意来做一些支持，所以从智库中间可能作为一个角度帮助学者找到尊重他，包容他。

王莉丽：今天谈了很多，今天真的很荣幸各位学者和各位朋友在这里讨论中国智库影响力构建与提升，并且一起来分享李成老师的新书。我觉得未来中国智库的发展尽管今天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者、从业者和管理者三位一体的角色，我觉得未来中国智库的发展还是应该说大有可为，因为当今中国处在一个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历

史进程之中，而整个中国崛起历史的崛起需要思想力的支撑，那么思想力的支撑来自于哪里？在中国，来自于我们众多智库的思想创新这个创新的发动机。因此我觉得从 09 年中国智库的快速发展其实严格意义上从 09 年开始，现在才 2017 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问题，也看到很多繁荣的景象，我觉得这是一个智库发展的黄金时代，它存在问题这个不怕，但是我们面对问题，不断地提升中国智库的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在未来中国的软实力会不断获得提升，而在座的年轻诸位，我相信你们在未来的五年十年，都会成长为中国思想创新软实力源泉中的重要的一员。谢谢大家。

房宁：我是中国第一大姓，中国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房东，一部分房奴，我是房奴，开玩笑。

三个化，别害怕，专门化。什么叫专门化？智库第一个部分叫专门化，研究这个问题前世今生，左邻右舍，行至上下，从头到底。就是你把这个问题都弄清楚了，你就是都明白，都是专家，现在中国的智库比较好的智库大概处于这个阶段，所以这还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这叫有基础了。第二个阶段，大概就是李成教授所在的布鲁金斯学会，包括李成研究中国的政治，这就叫专业化，什么叫专业化？专业化是有一些专门的工具，比如心理学它不是普通心理学，（英文）叫大数据人工智能浮选系统的 CI 的，CA 的那个心理学，那也就是说，大家还是没听懂，修车，你车坏了，轱辘坏了，你拿个扳子，拿个榔头，能把这轱辘卸下来也能装上去，但是人家 4S 店人家怎么，F1 八秒钟四个轱辘换下来还把油装上了，那就叫专业化，它有专门的工具，它研究这个问题有专门的工具，这才叫智库。我们现在说的还达不到，我们很多大部分的智库还达不到，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第三个阶段可能境界就更高了，就是所谓的职业化，职业化就是你包养也好，你是供养也好，反正你能够自我循环，但是在中国的事就比较复杂，我们这三个境界的，现在复杂在一起了，它四年，它已经职业化了。我们的四十年，我们还专门化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努力就是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田薇：很难总结。实际上最好的总结就是大家回去琢磨琢磨各位老师讲的这个话真的个中滋味。特别是房教授提出很多观点都中外贯通，其他的两位教授从各自的角度也在阐述我们现在智库的发展。我们特别要感谢李成教授，因

为有了他我能够读到这本书（英文），这是英文版，中文版叫做《理念的力量：影响未来的中国思想家和智库》，有了他我们能够请到他的这些好朋友来和大家聊一聊，同时也因为有了他，这是 101 年布鲁金斯学院唯一的一个华人的中心主任，让我们看到了实际上中西文化交流中间能够真正迸发出思想的火花，这种长时间的生命力，所以我们也感谢今天在场的各位老师，谢谢房教授，谢谢王莉丽教授，谢谢易鹏老师，谢谢我们的李成教授，谢谢。